

【文学艺术研究】

帝国与“新女性” ——哈格德历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书写

李欣¹ 王玉明² 骆雁雁³

(1. 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合肥 230601; 2.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合肥 230036;
3. 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19世纪晚期的英国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但女性主义的觉醒和“新女性”的出现,冲击了既定的性别秩序,造成了这一时期著名的“妇女问题”。该时期历险小说家赖德·哈格德的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她》和《阿莎归来》中刻画了不少这样具有情欲、权力欲与控制欲的“新女性”,她们以诱惑或控制等多种方式,削弱了男人们的男性气概、颠倒了既定社会的性别秩序、使男性利益共同体解散。她们对父权制社会的秩序形成威胁,并直接影响到当时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事业。哈格德小说中的这些“新女性”表现了作者因“新女性”现象产生的性别焦虑以及对帝国殖民事业的忧虑。

关键词:帝国;新女性;哈格德历险小说;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19)02-0010-08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海外殖民扩张的峰端,是英国综合国力最强劲的阶段。^[1]这一时期的大英帝国走向了世界之巅,其领土因所控制的殖民地面积扩展而不断扩张,海外侵略的版图遍布世界,成为“日不落帝国”。正是由于英国在这一时期进入海外扩张的高峰期,帝国海外扩张的进程催生出大量与远航、狩猎、非洲、寻宝等元素有关的历险故事。海外殖民活动的开展令以历险为主题的故事受到更多关注,于是历险小说大量涌现。该时代晚期小说家赖德·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1885)、《她》(1887)以及《阿莎归来》(1905)即为该时期历险小说的代表作品。但他的这些作品与同时期以吉卜林的《丛林

之书》(1894)为代表的历险故事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大多具有整体女性形象缺乏以及男性气概高昂的特点,而哈格德的历险小说中开始出现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中既有传统的“家庭天使”,又有反传统的“新女性”。其中“新女性”以情欲、权力欲、控制欲颠覆了传统女性的“家庭天使”形象,给男性带来诱惑及灾难,削弱了他们的男性气概,对男子同性社会交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造成瓦解,被认为对父权制社会的既定秩序和未来发展、甚至当时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都有消极的阻碍作用。哈格德对这类“新女性”的描写与定位,体现了他对“新女性”影响下传统性别秩序的颠倒、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男性气概被削弱以及帝国的殖民

收稿日期:2018-10-26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帝国与文化的共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小说女性主义研究(AHSKY2015D123);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委托项目:海外扩张与女性禁锢: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小说研究(SK2015A789);安徽省质量工程一般项目:基于产出导向法的专业英语课堂教学行动研究(2017jyxm0568)。

作者简介:李欣(1985—),女,安徽望江人,文学硕士,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王玉明(1970—),男,安徽天长人,文学硕士,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骆雁雁(1974—),女,安徽阜南人,文学硕士,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

宏图受到消极影响的焦虑。

一、从帝国的“家庭天使”到“新女性”

19世纪英国的公共生活以两分领域为特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被划分开来。工作、政治、运动场等属于男人的公共领域;女人的私人领域仅限于家庭生活。在这种模式影响下,公共领域日渐男性化,家庭领域全面女性化。女性被排斥在公共领域和男性空间之外,仅成为家庭的装饰品。^[2]大思想家雅克·卢梭在《爱弥儿》中声称“女人王国的边界被限定在家庭之内,这是她对其丈夫施加温柔以及启发性影响,培养下一代、给她的孩子们哺乳和灌输爱国美德之地。”^[3]男性通过其活动的公共场所起主导作用,按照父权制意愿制定各项支配女性的社会“准则”。因此,该时期的英国可谓为典型的男权文化社会,认为女性应该从属于男性、只能在家里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是这样的男权社会导致了女性“他者”地位的产生,使女性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身份,在社会、经济、婚姻和家庭中处于劣势地位^[4]。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于1854年完成的长诗《家庭天使》歌颂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相夫教子、温柔忍耐,并具有自我奉献精神。该诗在当时大受赞颂,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这种性别需求,体现了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

此外,这样的传统父权制社会结构剥夺了女性获取政治权力和资产的资格,使她们无法实现经济独立,只有依赖婚姻才能维持生存;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使大量男性流动到殖民地,需要女性安守家中进行操持;同时英国本土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带来的混乱,使家庭的安宁与温暖成为人心所向,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女性发挥自身特有的柔软能力和奉献精神。因此当时的父权制社会基于自身需求,要求女性担任以家庭为中心的贤妻和良母这两种角色,女性价值的体现被认为主要在于为男性服务、为家庭付出。这也是同时期的小说中女性基本只扮演着母亲和妻子这两个角色最核心的原因。这一点在约翰·拉斯金的演讲《王后花园里的百合》中也有所体现“女人的美德就是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和奉献精神,而这一切则在妻子和母亲的天职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5]在这样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年轻女性只能居于客体,没有话语权,并不得不局限于极为狭窄的家庭生活领域的附庸。^[6]

然而,随着帝国的海外扩张,越来越多的男性离开本土去殖民地寻找机会。这些作为家中唯一经济

来源的男性一旦离开家庭,原本安守家中的女性就不得不外出就业,承担起经济负担及社会责任;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可从事职业的范围获得拓展,她们得以从过去局限于家庭的贤妻良母转变为社会工作的从事者。与此同时,妇女解放运动的逐渐开展和女性意识的渐进,也催生了开始争取自身在教育、经济、爱情等方面独立自由的权利、并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7]

这些“新女性”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反对传统规范的制约。她们逐渐意识到与男性地位的不平等,开始渴望进入社会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向往自由、与男性平等的生活,其女性意识已经觉醒。^[8]她们逐渐意识到父权统治对女性精神自由的绝对摧残,对令她们“失语”的父权制社会不满、抗争,并强烈渴望早日摆脱。她们不再满足于主流父权制社会认同的“家庭天使”这一屈从地位,而要求实现男女平等。她们认识到自己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并有意识地探寻女性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当这些“新”女性将自己与传统角色分离开来并认识到了自我价值时,她就不仅是作为客体而存在,而且也作为主体而存在。^[9]高层次的女性自我意识说明她意识到了强加到女人身上的束缚和各种不公平现象,开始对父权制社会中的传统女性观念有所否定,并对男权社会秩序进行反抗。

在获得社交与就业机会后,很多“新女性”走出家门,进入了男性把持的公共领域,改变了英国社会固有的两分制社会分工模式。这时期的英国出现了女性作家小说这一特有现象,众多具有强烈女性自我意识的女性作家成为这类“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如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等。在保守的时代和思潮反衬之下,这些“新女性”的思想和行为都非常大胆、前卫、突兀,与时代格格不入。

“新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她们获取自身权利、控制自身命运、甚至实现对男性的反控等欲望高涨。此外,她们表现出与传统女性的克制和被动截然相反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体现出从未有过的情欲的觉醒。在英国当时传统的保守人士眼里,这样“不体面”的“新女性”群体的出现是令人焦虑的现象。主流男性话语对这类非“家庭天使”的女性持否定态度,有着强烈的性别抵触。他们担心新女性会取代传统女性、影响既定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以男权为导向的传统道德造成威胁。他们认为“新女性”会影响男性的权威,会冲击甚至颠覆既定的父权制社会秩序、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总之,女性自

我意识的觉醒与父权制社会结构之间矛盾重重,其导致的所谓“妇女问题”令当时英国的保守人士、尤其是帝国建设事业的狂热支持者们反感、忧虑。赖德·哈格德作为父权制社会的提倡者及帝国殖民事业的狂热支持者,正是这样的保守人士中的代表人物。他的系列历险小说作品中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其中就有不少典型的“新女性”。她们以其反过来引诱、牵制、统治、保护男性的形象、对权力的拥有和操控以及对爱情的大胆追求,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天使”女性形象,并对她们的生存造成威胁;削弱了男性主人公的阳刚之气,使他们在美色和女权统治面前失去了原有的男子气概,甚至瓦解了男性的同性社会交往。这些都反映了哈格德认为“新女性”的存在对当时的父权制秩序和帝国殖民事业有巨大的消极影响。甚至可以说,他创作的这些系列历险小说正是对同时期“新女性”现象的抨击、对“新女性”特质的抗拒及对“新女性”小说的反否。这类抨击与抗拒体现在上述作品的众多细节中:《她》中非洲殖民地母系氏族部落的女子们在爱情上积极主动,“其中最漂亮的一位女子用一种本该很迷人的姿态——假如不是那么断然决然的话——默默地搂住利奥的脖子,弯下身去吻了他的嘴唇”^{[10]80};“如果一个女人爱上了某个男人,她可以公开地走上前去亲吻他,以表示自己的钟情;^{[10]81}几名英国绅士们要在溪流边洗澡,这个部落的有些女人“就连那种地方也决意跟着去了”^{[10]86}。女王阿莎大胆直白地向情人表达她延续了长达两千年的爱慕与痴情,并当着他的面残酷地杀死情敌。《她》的续集《阿莎归来》中,阿莎与邻国的女王为争夺美男子利奥展开了战斗,阿莎凭借自己的超自然力量摧毁了整个邻国,致使死伤惨重。这两个“新女性”出于对男性不理智的激情和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和执着,导致整个王国生灵涂炭。这类细节的设定,说明哈格德认为这种“突兀”“不得体”的情欲与大胆只会带来灾难。

“新女性”除了与传统的“家庭天使”在性别方面的被动、感情表达方面的拘谨大相径庭之外,不同的还有她们强烈的权力欲与控制欲。她们不安于自身的屈从地位,有强烈的反传统、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控制欲望,以及将传统意识中不应属于女性的统治权握于手中的权力欲望。当时保守的主流男性话语认为女性一旦掌握了权力,将会有强大的毁灭性能力、产生严重的后果;认为女性只有通过使用阴谋、美色诱惑等不入流的手段,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操控;还认为一旦既定的性别秩序被“新女性”颠覆,整个

社会将失去稳定和安全。

《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老女巫加古尔原本只是个负面的非洲土著角色,但她对权力的欲望和操纵令她具有了“新女性”的特点。^[7]她调换了真正的国王,将掌控国家的大权握在自己的手中;控制着王国的巫女们、独揽权力呼风唤雨、将整个王国置于人心惶惶和战争杀戮中;她调教出的巫女们称呼她为“母亲”,以与之相同的“新女性”身份,参与了对王国的勇士和英国绅士们的血腥屠杀和追捕。《她》中所描写的土著人社会是典型的母系社会,妇女有与男人完全平等的权利,而且男人对她们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她们根本不在乎或根本不知道谁是她们的父亲,即使知道也不当回事。^{[10]81}她们拥有相当程度的性自由和男女关系中的主动性,可以主动拥抱和亲吻喜欢的男人,甚至厌倦了这个男人时就能直接结束两者的关系。而该社会的男子们则是“当他们的妻子抛弃了他们而另有新欢时,他们对此安之若素”^{[10]82},这是与维多利亚时期男权社会秩序完全相反的习俗。这个土著社会最终以血流成河、死伤无数的结局告终,这可视为哈格德对颠覆传统社会秩序的警示。

“新女性”对权力的操控和滥用导致的严重后果在《她》中对女王阿莎的描写体现得尤为明显。阿莎统治王国上千年,人人称她为“不可违抗的她”。但那并非凭借政治、军事能力或过人的智慧实现,而完全是凭借她的超自然能力和恐怖统治。“这个国家里谁敢怀疑她的权威,便会立即死去。她有卫士但没有军队,违抗她便是死路一条”^{[10]90}。除统治自己的王国以外,她甚至决定前往英国本土推翻女王,替她爱的男人夺取王位。“显然这个可怕的‘她’决心要去英国了。她的狂傲和野心最后肯定会冲破一切束缚,恣意妄为;我毫不怀疑最终她将统治整个大英帝国,甚至可能统治全世界”^{[10]266}。值得一提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本身是那个时代女性道德风尚的典范:她是贤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也是优秀的一家主妇;她恪守当时传统女性及君主的本分,以不作为的方式成为那个时代最美好、最高尚的女性的表率。^[11]而阿莎竟然妄图以握有可怕权力及能力的“新女性”身份去推翻她的王位,这显然是哈格德眼中“狂野放肆”的“新女性”对以女王为代表的传统女性造成的威胁;这类设定必为阿莎这样的“新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权主流文化中招致普遍的反感与排斥,同时也体现了哈格德本人对在意识方面对这类反传统女性的抗拒和否定。

哈格德笔下的阿莎及加古尔这样的“新女性”

以其不可控制的权力,严重威胁着传统父权社会结构的稳定与整个世界的安全,所表现出的是毁灭性的负面力量。他这般书写的目的在于论证这一观点“新女性”手里一旦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又被非理智的激情所左右,就会导致及其严重的后果。“新女性”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家庭天使”,她们将后者置于自身阴影之下,并对她们有不可忽视的消抵作用及潜在威胁,从而影响到父权制社会的长治久安,乃至阻碍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事业进一步开展。

除刻意突出“新女性”的情欲、权利欲等反传统特质的负面影响外,哈格德还将这些“新女性”无一例外地与蛇相联系。《所罗门王的宝藏》中“加古尔像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石门下的缝隙钻了过去”^{[12]312};阿莎更是“全身散发着一股无可比拟的蛇一般的气息”^{[10]143};她发怒时“头往后一仰,就像蛇要发起进攻时那样令人不寒而栗”^{[10]160}。根据英国的文学传统,蛇往往与邪恶相联系,《圣经》中就有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诱惑而堕落的故事。因此,哈格德对阿莎等“新女性”与蛇之间进行普遍联系,显然意在暗示她的美色与魅惑也会和蛇的邪恶一样、像被迷惑的夏娃一样,给大英帝国的男性和未来造成威胁。

哈格德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明显的类型化特征,除了从各种否定角度对“新女性”进行抨击之外,还将其与所对应的“家庭天使”形象进行对比,产生烘托的效果。《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弗拉塔以及《她》中的尤思坦,都是传统“家庭天使”的代表。加古尔要杀掉弗拉塔做祭祀之用,关键时刻英国绅士古德将她从加古尔手中救了出来。她从此成为古德的女仆,并在古德受重伤时照顾他“她每天要在床边照料他十八个小时”^[13];“我相信如果不是有弗拉塔的精心照料,古德必死无疑”^[13]。《她》中的尤思坦爱上英国青年利奥,当她的族人企图杀死利奥时,她“伏在利奥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掩护着他,使他们伤不着他的要害”^{[10]104},体现出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利奥生病时,她守在他的身边极尽体贴地照顾,“她真是我前所未见的最温柔体贴,最不知疲倦的护士了”^{[10]125}。弗拉塔与尤思坦虽为土著女子,但她们对男性的奉献、顺从和依赖使其具有“家庭天使”的特征。^[7]然而这些“家庭天使”的结局十分悲惨:弗拉塔被选作献祭的牺牲品,最终惨死于女巫婆加古尔刀下;尤思坦与利奥相爱、结婚,可女王阿莎逼迫尤思坦让出利奥,在遭到拒绝后便残忍地杀害了她,这喻示着“家庭天使”在掌握权力的“新

女性”阴影之下存在着巨大的危机。

哈格德对传统女性的肯定和赞美以及对“新女性”的否定和谴责,还从他对两类女性的外貌及肤色的描写中得到体现。《所罗门王的宝藏》中老女巫加古尔刚出场时,被描述为“一只在我们看来像是裹着毛皮斗篷的身材干枯的猴子”^{[12]272};对她的正面描写则是“她满脸都是又深又黄的皱纹,会被误认为是一具干尸的脸”^{[12]274}。哈格德显然将加古尔这个“新女性”动物化、妖魔化,对她“黄”色肤色的着重突出,更是将其列为与白人殖民者相对立的“他者”。同样强调肤色的还有《她》对阿莎结局的描写:阿莎踏入圣火中后,身体迅速恢复到两千多岁的衰老和丑陋“洁白如玉的肤色变得又黑又黄”^{[10]306},死的时候又化为“可怕的猴子似的尸体,那皮肤就像皱巴巴的黄色羊皮纸”^{[10]308}。黄和黑这些颜色的选择暗示哈格德将阿莎定位为卑贱的有色人种这一“他者”^[13]。相比之下,哈格德对弗拉塔和尤思坦这两个传统女性形象的描写正面得多。《所》中弗拉塔出场时,“这个美丽的年轻女孩那活泼优美的舞姿,令任何一名芭蕾舞演员都自愧弗如。后面的女孩无论是身段、舞姿还是美貌,都无法和她媲美。”^{[12]285}《她》中的尤思坦“长着一头介乎棕色与栗色的头发,是围观的女人们中最漂亮的一位”^{[10]80}。

此外,哈格德对两者特质进行了鲜明对比:代表“新女性”的老女巫年老虚弱、阿莎死时呈现两千多岁的衰老;代表“家庭天使”的弗拉塔和尤思坦则年轻活泼、体力充沛。哈格德在这类细节方面的设定,隐喻着他认为传统女性仍大有活力,而“新女性”的存在注定不能长久。哈格德的这些作品中,家庭天使虽被“新女性”迫害、甚至失去生命,但“新女性”本身的结局也是以死亡告终。《所》中加古尔被石门夹住惨死;阿莎被烈火焚烧至“一团黑色包裹”。相比传统女性为白人男子奉献生命而去世的“伟大”,这些“新女性”的死亡显然是人心所向。哈格德为她们设定死去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新女性表现出的特质与男权社会的性别设定根本不吻合,是男权主流文化所不能容纳的。相比之下,作者自始至终对家庭天使类型的女性的许可及偏袒则说明父权制社会中主流男性对传统“家庭天使”的认同。

二、“新女性”与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

“新女性”的存在不仅使“家庭天使”处于危险的阴影中,更颠覆了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

自古都是男性争夺女性,如古希腊为争夺美女海伦而发生的特洛伊木马战争和中国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然而,“新女性”却反传统地将男性视为欲望客体,颠覆了传统性别秩序。“新女性”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对男权语境中的主流男性造成威胁、颠倒既定的社会性别秩序:

1. 美色诱惑

阿莎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中年男子霍利与其养子利奥是理想的英国绅士和男子汉。霍利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具有学识与智慧、颇负声望。他有厌女症,“怕女人犹如人之怕疯狗一样”^{[10]3}。据霍利自己所说“我的心如铁石,早已不为女色这样虚妄的东西所动”^{[10]157},然而阿莎深知自身美貌是魅惑男人的利器“凡是见过我的美貌的人就永远不能将之忘怀”^{[10]158};“美貌犹如闪电,可爱但也具有毁灭性”^{[10]160}。她的美貌让一向不近女色的霍利都根本无力抗拒,甚至跪倒向她求婚,“我一下子跪倒在她面前,神魂颠倒,语无伦次地极尽赞美之能事,向她求婚,表白我将矢志不移地爱她,当时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10]195}。当霍利视为亲子、爱逾性命的利奥生命垂危时,霍利却满脑子只想着阿莎,他不由发出感慨“女人的秋波一闪就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把最正派的男人引向邪恶”^{[10]200}。

尤妮坦被阿莎杀害之后,利奥愤怒地谴责前者为凶手,表示会永远恨她。阿莎则嘲弄道“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拜倒在我脚下,发誓说你爱我的”^{[10]235}。她以真面目示利奥后,后者“痉挛的铁板似的面孔柔和了,迷惑不解的神情变成了赞美和渴求”^{[10]235},“她坚强的意志和狂热的热情像魔法般注入了他的心田,控制了他的行动”^{[10]236}。被阿莎美色俘虏的利奥很快就投入阿莎的怀抱,令霍利感慨道“大凡这种卖身求欢、背信弃义、为纵情声色而道德沦丧的人是难以拯救的。”^{[10]237}利奥清醒后十分痛苦“我真真是个下贱的畜生!可我又无力抵抗那个可怕的巫婆。我知道我永远在她的控制之下了。”^{[10]250}霍利与利奥两人“就像灯蛾扑火一样,明知是死也趋之若鹜。我们就像两个吸鸦片的瘾君子,头脑清醒时深知此物毒莫深焉,但谁也无法就此悬崖勒马”^{[10]250}。

“新女性”利用美色诱惑男性从而实现目的,对男性而言这种美色无疑是一种陷阱,会吞噬他们、毁灭他们的独立、尊严和男性权威,对他们的道德及人格有严重威胁。当男性失去上述这些英国绅士应有的特质时,又如何为帝国殖民事业继续奉献,如何为建设大英帝国的未来出力?哈格德通过渲染男子在

美色诱惑面前失去道德、品行、人格、尊严、绅士风度,论证了“新女性”能对男性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2. 男性气概的削弱及角色颠倒

维多利亚时期的两分式领域论设定公共领域应由男人掌管,女性则在私人领域内担任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在这样“男女分工不同”思想的影响下,为拓展殖民地和建设帝国而展开的历险被看做是属于男性才能进入和参与的范畴,女性则被排除在历险行为之外^[7]。《所罗门王的宝藏》开篇就声称“这里没有一个女人”,划定了小说的男性主题。哈格德认为一旦女性处于主导地位、而非被男性引导,就将削弱男主人公们的男性气概。任何女性都可能对男性造成威胁,因此小说中不愿承认女性的存在^[14]。

《所》中的三位英国绅士英勇善战、身强体壮、富有智慧,具有良好的理性思维能力。无知、凶残的土著“他者”的存在以及两者间的战斗,更加凸显出他们拥有强大的男性阳刚气概。然而,当“新女性”让他们无法继续保持理性思维及无畏精神时,他们的男子气概就受到了威胁,并被削弱;这种对英国绅士男性气概的削弱又会直接影响英国的殖民扩张事业。

《她》中霍利第一次去觐见阿莎时拒绝下跪:“我是个堂堂的英国人,凭什么要像个猴子似的爬到一个野蛮女人面前?一次屈膝,永世不得伸腰,等于公开承认自己低人一等”^{[10]140}。霍利拒绝下跪表现出他的男性气概,是值得称赞的英国绅士行为。但在极负权威的阿莎面前,霍利很快“吓得瘫倒在地,语无伦次地嗷嗷起来”^{[10]160},毫无应有的男性气概。《阿莎归来》中也描写了两位男主角在阿莎面前的多次跪拜。事实上,男性身体是男性气概的重要载体^[15]。曾于1825年至1829年任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认为:身体是主权和整体的隐喻。跪拜象征着“屈辱和卑下”,意味着屈辱的从属^[16]。1793年,英国访华使臣马戛尔尼拒绝向中国乾隆皇帝行跪拜礼,引发了中英矛盾。他将磕头视作对帝国自有秩序的冒犯,他拒绝磕头说明大英帝国意图通过体态来构建帝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他带领的使团归国后,其拒绝向中国乾隆皇帝叩首的故事在上层社会中广为流传,使他成为英国民众心目中维护英国国格和个人尊严的英雄,连华兹华斯、简·奥斯丁都成为该故事的读者。英国人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捍卫了英国人的国格和人的尊严^[15]。

相比之下,霍利和利奥对阿莎的反复下跪,标志

着他们已经失去英国绅士应有的男性气概,这也改写了他们的结局。《她》中霍利与利奥在对抗土著的过程中勇猛无敌,但自从拜倒在阿莎的美色和权威之后,就失去了曾有的刚勇。在《阿莎归来》中,利奥想通过参加与其他部族之间的战斗来重申男性气概,却被对方抓走,只能等待阿莎前来解救。失去男性气概的男子从保护女性转变为不得不靠女性保护才能生存下去,又有何能力去开疆拓土、建设帝国?战争结束后,阿莎勉励利奥去追求更大的权力和荣耀,但他却只想和阿莎结婚。这个被“新女性”影响而失去了昂扬斗志、进取精神的男子丧失了男性气概,再也无力像从前一样为帝国冲锋陷阵、开疆拓土,进而失去了帝国英雄的光辉身份。《失乐园》中夏娃曾对亚当表白“上帝是你的主宰,你是我的”,奠定了父权制社会男性的权威地位。然而身负帝国建设任务的英国绅士利奥却向阿莎表白“你是我的主宰,我是你的奴隶”^{[10]264},说明“新女性”已颠覆了传统性别角色,扰乱了既定的性别秩序。

3. 瓦解同性社会交往

19世纪末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种强调男性气概的“阳刚情节”模式:男性拒绝婚姻、离开家庭去历险,从而排除女性的影响。男人从同性那里获得鼓励、支持,形成男人之间的可靠同盟,以此完成自己男性身份的建构。在哈格德看来,理想的英国人是具有自由精神和探险精神的冒险家。他们愿意接受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拥有一颗勇敢的心,因此他笔下的所有男主人公都是冒险爱好者。通过对冒险行为的强调,他在其系列冒险小说中重申了包括同性社会交往、勇气、责任与团队合作在内的“男性气概”^{[17]40}。

然而“新女性”不仅削弱了男子气概、颠倒了性别秩序,还破坏了“同性社会交往”。哈格德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在历险的过程中团结紧密,无论是面对严峻的自然界中的挑战还是与凶残的土著之间进行战斗,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但这些男性社会团体的稳固却因“新女性”的介入而动摇。《她》中的霍利原本对他的养子利奥爱逾性命,“他是我二十年来最亲密的伙伴,我生活中最大的幸福”^{[10]200},但霍利爱上阿莎后,竟然开始担心病重的利奥一旦醒来,会“成为与我竞争阿莎的情敌”^{[10]164};当利奥为阿莎的美貌震慑、在她面前拜倒时,霍利“妒火中烧,甚至想把利奥打翻在地”^{[10]236}。这样鲜明的对比说明人伦和亲情在“新女性”的诱惑面前受到了威胁,单身男性的联盟有崩解的危险。《所罗门王的宝藏》系列小说中的三个单身白人绅士组成的探险

团队精诚团结,无往不胜,在与土著的战斗中节节胜利,集中体现了帝国在海外殖民扩张事业中应有的坚毅、勇敢、积极、阳刚之美。若这个团队继续以帝国的进一步发展为已任、以继续探险为目标,将会做出更伟大的成绩。然而,他们的探险事业却因为其中一员与某一土著王国的女王结婚而瓦解,使这个男子汉团体的进一步探险被迫中止,未能真正实现历险、完成帝国建设的事业。哈格德借此表达了他对“新女性”的否定和批判。

三、“新女性”对帝国的威胁

阿莎除了以权力欲、控制欲、情欲等“新女性”特征对帝国的男性和事业造成威胁之外,其自身母性的缺失则是另一个影响帝国安全的因素。她常年生活在石洞中、与尸体为邻,这是女性生育方面的大忌,不利于繁衍帝国的下一代。女性的生育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关乎帝国未来的大事。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当时传统美好女性的代表,育有9个子女;乔治三世的夏洛特王后生养了15个孩子,被视为重要的道德图腾^{[18]325}。卢梭认为“那些为了外面的世界而忽略其家庭、把其婴儿交给外人看管,或者最糟糕的,是控制生育的女性,危害了国家,也违背了她们自己的本性”^{[18]294}。大不列颠的福祉使妇女继续按照传统方式行事变得至关重要。狂热崇拜母性的生育能力,极大地吸引了那些相信英国的人口在下降以及那些只想有更多婴儿能顺利诞生,以便在与他国竞争时能更有利的人。^{[18]295}随着欧洲战争规模的扩大,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大量的妇产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连威尔士亲王都资助建立了名为“居家已婚妇女分娩后救助协会”,其座右铭为“儿童越多,国家越强”^{[18]295},这些都论证了英国人对妇女生育下一代的重视程度。

在前述几部哈格德的冒险小说中,《所》一书中的白人绅士们接触到“新女性”之后往往受困于幽闭的山洞和石洞之中,如老巫婆加古尔把还在襁褓中的真正国王困在石洞里、篡夺了他的王位,继而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的国家动乱和腥风血雨;她带前来探险的白人勇士们走进藏宝石室后,设计关上了石屋的大门,想将他们困在里面等死,使他们“惊恐万状地站在那里。我们现在明白了,那个魔鬼加古尔早就策划好了这一切”^{[12]313};阿莎将她杀害的人、甚至她情人的尸体放在石室里。在这样连生命都受到威胁的前提下,男性的权威与强大根本无从谈起。阿莎还在她居住的石室中以美貌诱惑霍利和利奥,使他们失去了理智和男子气概。有不少学者认为这

些山洞和石室隐喻大地母亲的子宫,与女性联系密切,正因如此,它们对男性的围困象征着“新女性”对男性气质的戕害;男性受困于山洞的描写,反映了男性受制于女性的焦虑。“新女性”在生育大事方面的不作为以及对生命的埋葬,是“新女性”戕害男性、妨碍帝国事业发展的明证,因此不可能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天使”虽处于从属地位,但也可以参与帝国的扩张与建设。尽管女性被要求毫不含糊地以女人的方式去观察、感受和行事,但在实践中,许多英国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参与到公共领域,尤其是爱国活动中。^{[19]309}事实上就大不列颠而言,对英雄主义的崇拜日益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女性对国家建设的热情。英国妇女在帝国各种战争的爱国主义行动中,都为她们的精力和组织能力找到了用武之地,并承担了某种公共角色。她们或为军队组织募捐钱款和服装、建造储存衣物的仓库,或为军队缝制旗帜和标语,更与男人们一起策划募捐或参与现成的募捐。这些妇女为战争做贡献的方式为社会所认可,因为这可以被视为仁爱、照看孩子和做针线活等妇女传统美德向军事领域的延伸。然而在英国主流社会看来,妇女们的这些行为代表的是一种由小及大的激进发展的开端,主流男权社会不接受妇女们为自己锁定的这种公民角色,而是要求她们囿于家庭的领域,避免扰乱父权社会秩序。妇女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数以百计保存至今的这些爱国捐款人名单中所包含的有关妇女财产和家庭政治的史料价值,这一事实也充分体现了主流社会及男权文化对女性在帝国扩张事业中所起作用的否定和贬低。

尤其是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维多利亚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抛头露面积极在外活动,女性构成了城市人口的主体。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男权社会中的道家们越来越焦虑其对女性面貌和行为举止的影响,对两性角色的忧虑在英国体现得日益明显。^{[19]295}女性们正在改变的、异于传统“家庭天使”的行为举止和外形轮廓,被看做进一步证明了世界正在发生危险的变化。这样就使得对于妇女地位的争论,成了更广泛忧虑的交汇点。在国外战争与革命以及国内社会和经济加速转变的巨大压力之下,英国人抓住相对不那么巨大的妇女地位的改变,将其视为所有令人不安和具有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表征。^{[19]296}维多利亚时期对妇女的行动自由和观念解放越来越焦虑,对其严加控制的决心也越来越强。^{[19]304}文学作品是时代的载体,因此这种焦虑也

日益集中体现在该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哈格德的上述作品通过对这些“新女性”形象的书写,体现了这种性别焦虑,这也正是哈格德上述历险小说的核心主题。

四、结语

哈格德的上述历险小说虽从殖民的角度突出了殖民主义对土著的影响、体现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但它们的重点仍是通过讲述男性历险故事,来刻画“新女性”们以完全有别于“家庭天使”的情欲、权力欲、控制欲等特点,对男性造成的危害及对帝国殖民事业的潜在威胁。这些“新女性”形象以死亡或回归传统的方式,成就了这些历险故事的结局。这反映了作者对“新女性”这个群体的存在具有不安与焦虑感,以及他主观上希望父权制社会秩序和男性处于主导地位的性别秩序能够获得一如既往的维护。作为维多利亚晚期的性别保守人士和帝国建设事业的激进主义者之一,哈格德对传统的“家庭天使”和“新女性”持有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褒贬态度。他的历险小说中开始出现女性形象,相比之前的历险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完全缺失,反映了社会整体思潮的前进,然而他仍未摆脱时代的局限性。这些历险小说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立场,更折射出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男性的心态、倾向和利益。哈格德的这些历险小说在当时的风行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可视作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意识渐进的体现以及英国主流社会对“新女性”现象的整体反思。

[参考文献]

- [1] 陈亚敏.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欧洲大陆文化的兼容与外输[J]. 教育现代化 2016 (17): 23-25.
- [2] 周子玉. 电影改编中女性的出场与缺席[J]. 文艺争鸣 2011 (3): 28-30.
- [3] [法]卢梭. 爱弥儿[M]. 彭正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
- [4] 杨建玫. 女性的书写: 英美女性文学研究[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12.
- [5] [英]约翰·拉斯金. 芝麻与百合[M]. 瞿红霞, 余艳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37.
- [6] 吴娟. 从觉醒到回归的渐进——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探幽[J].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7): 66-71.
- [7] 陈兵. “新女性”阴影下的男性气质——哈格德小说中的性别焦虑[J]. 外国文学评论 2018 (1): 137-153.
- [8] 施慧. 从简爱和玛姬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观[J]. 世界文学评论 2009 (5): 281-283.

- [9] 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vol. I: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71 – 225.
- [10] [英] 赖德·哈格德. 她 [M]. 胡心吾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 [11] 钱乘旦, 许洁明. *英国通史*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12.
- [12] [英] 赖德·哈格德. *所罗门王的宝藏* [M]. 蔡辉译.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4.
- [13] 张金凤. “他者”形象与世纪末“焦虑症”——解读哈格德的《她》[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报*, 2010, (2): 93 – 97.
- [14] 刘蔚. 《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男性气概的建构[J]. *哲学文史研究*, 2018, (2): 51 – 52.
- [15] 唐丽伟, 季水河. 男性气质的危机与建构——以欧茨小说《奇境》为例[J]. *海外文坛*, 2017, (2): 140 – 144.
- [16] 王冬青. 想象“磕头”: 英帝国的身体政治[J]. *外国文学评论*, 2015, (2): 116 – 129.
- [17] 王荣. 追寻“失落世界”——赖德·哈格德罗曼司中的非洲想象[D]. 杭州: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18] 郭方. *看得见的英国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9] [英] 琳达·科利. *英国人: 国家的形成, 1707—1837 年* [M]. 周玉鹏, 刘耀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责任编辑 张 敏]

The Empire and “New Women” — Female Images in Haggard’s Adventure Novels

Li Xin¹, Wang Yuming², Luo Yanyan³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ritain is a typically patriarchal society. However, the awakening of femin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women” have impacted the established gender order, resulting in the famous “women’s problem” in that period. In the novel *The Treasure of King Solomon*, *She* and *The Return of Asha*, the famous adventure novelist Ryder Haggard of that period depicted many “new women” with such lust, power and control. They weakened their masculinity, disbanded the male interest community and reversed the established gender order by temptation or control. They threatened the order of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directly affected the colonial expans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t that time. These “new women” in Haggard’s novels show his gender anxiety caused by the phenomenon of “new women” and his anxiety about the imperial colonization cause.

Key words: the Empire; “New Women”; Haggard’s Adventure Stories; Female Images